

中生代
思想书系

学术与制度

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刘龙心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学术与制度

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刘龙心
● 著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与制度 / 刘龙心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225-319-3

I.学... II.刘... III.史学—研究—中国 IV.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177 号

学术与制度

刘龙心 / 著

责任编辑:耿红平

装帧设计:林涛 秦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19-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坦白说,八年前当我刚刚开始构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少数师长及朋友之外,并无太多人知道我究竟想做些什么。长久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一种看法: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是两码子的事。虽然,我一直很清楚地知道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互馈”的关系,而我也非常想从史学史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两个“范畴”,但怎么着手,还很茫然。

直到四年前(1997年)暑假,带着一份极不成熟的撰写大纲,只身前往大陆找资料。一个半月里身陷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图书馆,载回两箱超重的行囊,满满的资料堆叠出我更大的疑惑。

只是这个时候我的疑惑已经不再是怎么着手,而是如何消化这些材料并且建构这么一个庞大的问题。慢慢地,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开始把焦点集中到“类别知识”方法的这个角度上,换言之,我发现在近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类别知识方法的不同导致现代学术无论在分类概念、知识性质和学科界域上,都与传统学术有着极大的不同。而学科体制的出现,尤其带动了知识内涵的转化。

始终相信,任何一种有机的研究或创作,必须照看自己生命的深层内里才能完成。即使这样一本疏陋的论文,在日升日落的一千多个日子里,反复出现、一再咀嚼的是自己大学以来的求学历程;几度自问在这个学科体制里我究竟接受了什么?忽略了什么?甚至习惯了什么?何以类别分科的概念会影响史学内部的分类架

构？何以体用对立的思考形态会阻断学术分科的进行？明明已经建立的制度何以又再复返原型？而传统知识结构的分化又为什么与史学学科界域的形成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联？渐渐地，从枯燥无味的制度中，我看到了活跃于制度底层人群的活动与思考，也看到了曾经参与建构体制的人，最终不免也为制度所塑；制度不再是孤悬的条文，也不是乏味的规章，制度背后所显映的是人们对问题思考的路径以及对时代所做出的反想。随着历史还原的过程，个人经验不断地置入与抽离，慢慢发现到原来我所构筑、还原的不再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更是自己十数年来的生命历程。

这是一本由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小书，在写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感谢的是杜维运先生。自1989年考进政大硕士班以来，即从杜师论学，从早期所修史学理论与实习、中国史学史专题等课，到后来撰写硕士论文《史料学派与现代中国史学之科学化》，以至今日的博士论文，杜师非但领我进入史学史研究之门，更引我走向宽广的学术天地。写作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问题，杜师总给我最大的包容与鼓励，每有小小创获，杜师也从不吝在文稿上加注密密圈点并为文称许。12年来感受尤深的，除了是杜师温厚谦和的处世风范，更是对史学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不减的热情，即使年逾古稀仍坚守阵营、写作不辍，让作为后生小辈的我，时时惕励不敢或忘。其次要感谢的是王汎森先生，与王先生相识于他在政大的一场演讲，此后更多次就此论题就教于他。特别是王先生后来又成了我论文的口试委员，口试当天王先生提出非常多深入而有建设性的意见，予我观念与资料上的提点尤多。其间更蒙其引介，认识了四川大学的罗志田先生，并将论文中的一部分刊载在罗先生所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一书中，与罗先生书信往返论辩的过程，亦受益良多。

论文口试时，阎沁恒先生、黄福庆先生和林能士先生等诸位师长，也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只是有些意见无法借此次出版之际一一改正，是我个人要负全责的。多年来，政大优厚的求学环境

与师生情谊,给了初入学术之门的我一个十分自在的空间,诸多师长、同学的垂询与关注,也带给我许多坚持以往的勇气,王寿南先生、胡春惠先生、张玉法先生、张哲郎先生、周惠民先生、彭明辉先生,以及杜丹、简秋慧、吴蕙芳、林兰芳、潘光哲、陈以爱、陈鸿图同学友,都是我衷心要感谢的。此外对于沈松桥先生、陈弱水先生、游鉴明女士、张寿安女士、张瑞德先生、张力先生、黄克武先生、卢建荣先生,对本书任何一部分的批评与建议,都在此一并深致谢忱。而华东师范大学的胡逢祥先生、张文建先生和黄爱梅小姐,以及北京图书馆的许进女士、上海图书馆的刘澜女士,在我赴大陆搜集资料时提供的协助与帮忙,至今难忘。母亲与家人的支持与体谅,更是我漫长求学生涯的最大支柱,兄嫂每周定期的聚会,既是消遣也是论学,人生至乐莫过于此。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这五年多来朝夕相伴的先生吕绍理,没有他的相知与包容,我不可能如此从容无忧地写作。不论在我意兴勃发,或是颓然消沉的情绪中,他总是用他一贯的乐观与沉稳,给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数不清几个夕阳西斜的傍晚,我们牵手走向后山,一边舒散劳累一天的筋骨,一边交换一天的思考,或者激辩如潮,或者静默以对,直到太阳下山,华灯初起,才悠悠回家做饭。如果这本书有任何一点点创见,绍理皆与我分享。全书出版在即,却还有太多不及改动的论点与缺失,不过一切只能寄诸来日了。

刘龙心 谨志
2002 年元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学制建立与历史教育系统化的出现	13
第一节 晚清学堂教育与学科体制的建立	13
第二节 新式学堂与历史教育的变革	40
第三节 重编国史运动对历史教育的冲击	68
第三章 新史学与学院化史学之建置	97
第一节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与史学独立意识的萌现	97
第二节 从国学研究到专史设科 ——史学专门化的确立	125
第三节 课程标准化和史学人才的培育	161
第四章 学科规训与现代中国史学的专业化	217
第一节 方法论的建立与史学纪律的形成	217
第二节 教学与研究——专业史家资格的评核与认证	257
第三节 客观标准与学术环境的追求	288
第五章 结论	312
征引书目	321

第一章 绪 论

或许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一个面临解构的年代里,来谈一个结构形成的问题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这个快要被我们解构的结构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作为一个专门记录别人历史的人,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有多少了解?特别是从事现代史学史或学术史研究的我们,又是不是曾经花过一点点时间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并思考一下这个长年供养我们习史、写史的环境究竟是怎么形成?怎么出现的?而这样的环境,又给了我们什么影响?什么训练?甚至于什么限制?如果我们必须费力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是代表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所知太少?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写别人的历史?

在从事民国史料学派研究的过程中,经常环绕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民初史家不断地希望从清代考据学当中去挖掘出现代史学的某些精神与特质?而这些问题除了从学派、人物、思潮、运动或特定机构的角度来观察之外,[1]我是不是能够从一个更广阔或更

[1] 目前台湾及大陆地区有关现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论著中,以学派、思潮和运动、人物为取径的研究所占比例最高。详见:刘龙心,《七十年来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史”(1902—1949)的研究回顾与评析》,收入:“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1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页1051—1088。

结构性的因素里去找寻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开始留意制度面的发展对中国史学所带来的影响。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梁启超在《新史学》上的一段话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1〕面对这段经常为人引述的话，我不禁怀疑如果史学确是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那么传统史学又为什么还存在如何向现代/西方转化的问题呢？直到后来，持续从制度史的面向去观察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久处学科体制下的我们，已经难于梁启超话语的细微处看出：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换句话说，一个世纪以前，当中国知识分子正努力为中西学术会通之道找寻出路时，不会想到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几乎无法分辨何者为中学，何者为西学；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不但主宰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我们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认知，以致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以“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

事实上“学科”这个名词，是清末采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才逐渐由西方引进的一种知识分类概念，在定义上，它具有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约束以至熏陶等多重含义，〔2〕在中文里没有完全相对应的字眼可以涵盖。透过新式教育的推广，这种以知识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学科概念，非但正式成为近代教育体制中分门画界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基本架构。〔3〕因此如果我们企图从制度面的角度，去

〔1〕 梁启超，《新史学》，收入：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页1。

〔2〕 J.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e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 4, pp. 574 - 575.

〔3〕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后半叶（约在1850—1914年间），西方国家基本上透过三种方法把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加以制度化：一、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科系；二、成立国家学者机构；三、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转下页）

观察现代中国史学建立的问题时,绝不可能忽略学科体制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以学院为基础建置的大学,更是形塑整个学科体制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不以大学为观察基点,无以说明现代中国史学建立的过程。

放眼西方学术界对于学科问题的讨论可谓十分丰硕,除了一些综论大学体制与学术专业化的论著之外,[1]也有不少关于个别学科的研究,[2]就以史学这门学科而言,专论法国、美国史学专业化的代表作就有好几种。例如 William R. Keyler 的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就是探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法国史学在大学中逐渐形成一门学科的过程。[3] 作者认

(接上页)见: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鉴学派》,收入: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213—214。有关此一课题,华勒斯坦另有一书专门讨论19世纪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典范建立的局限性。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7—22, 185—226.

[1] 例如瑞典学者 Bjorn Wittrock 等人,就曾针对 19 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逐渐走向专业化的过程提出观察。他们大多认为 19 世纪以后的大学,无不必须面对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之后的挑战,而专业化的趋势以及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教育,又逐渐成为 20 世纪的主流。见:Rolf Torstendahl,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oger Geiger, “Research,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Ecology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jorn Wittrock,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以上三篇论文俱收入:Sheldon Rothblatt and Bjorn Wittrock ed.,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西方著作在谈到专业化的问题时,最常以法律、医学等特别需要专业技术的学科,作为探讨对象。例如 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William R. Keyle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为法国史学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中,由于教育体制接近中央集权的特性,所以使得一些具有主导力的史学家们,不仅在史学界或学院内部能够发挥其影响力,就连对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数学方法上,他们亦多所献替。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训练人才的机构几乎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以致学科之间的互动程度远较美国或德国来得更为紧密,而这个特色不但有助于他们建立严密的专业纪律和规范,同时也是促使法国史学界更为重视方法论探讨的主因。〔1〕其次,像是Theodore S. Hamerow的*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2〕则是一部专门讨论美国史学专业化的作品。作者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愈趋没落的现象十分忧心,他认为这个现象绝对与史学本身的专业化有关,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重新回过头来检讨史学这个“专业”的本质,以及它如何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作者指出:美国史学的专业化,基本上与大学体制的建立、中学教师需求量的增大,以及自然科学专业分工的影响,和各种慈善基金会的挹注都有密切的关系。反观这些特点,虽然未必都能一一套用在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进程中,但是作者针对史学专业化所做的反思,确是全球化现象出现以后,中国史学界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再者,Peter Novick所著之*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一书,〔3〕则是讨论

〔1〕 William R. Keyler认为由于法国学术界之间的集中性与互动性较强,所以在史学开始进入学院体制之后,法国史家便希望借着方法论的探讨,以厘清史学与哲学、文学之间的界线。其中又以朗格罗瓦(Charles V. Langlois)和塞诺波(Charles Seignobos)为代表人物。见:William R. Keyle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pp. 5-6, 75-89.

〔2〕 Theodore S. Hamerow,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7.

〔3〕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客观”概念何以会成为 100 年来美国专业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学术资产,并且分析此一概念如何产生,如何修正,又如何遭到质疑和挑战,以及如何回应等问题。作者认为史学专业化的目的其实就在建立一套客观的标准,而专业化与客观化的要求乃一体之两面。美国史学界自 19 世纪末受到德国兰克学说的影响开始,即分别透过教学活动或是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以达成客观化的要求。这个要求使得史学逐渐脱离业余者的角色,并得以跻身学院之林。然而欧战爆发,却为美国史学界的“客观精神”投下变数,过去那些深受德国史学濡染的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面对战争中的“德国敌人”。基于美国史学界亲身遭遇的实例, Peter Novick 强调:客观不能只是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来谈,更要注意史学家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遭遇与挑战,因为这些际遇都会回过头来质疑客观性成立的基础。

借由 Peter Novick 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不但会出现不同的“客观”标准,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专业组织特性,因此某一国家史学专业化的经验,往往不能遽以为其他国家专业化的判准。就如 Charles E. McClelland 认为“专业”一词所包含的九大特质,^[1]未必全然适用于所有国家;英美等国自由结社的传统与德国政府部门的力量,分别造就英美与德国专业化不同

[1] McClelland 指出德国社会科学对于“专业”一词所包含的特质及定义为:(1)高度专门化及进阶的教育训练;(2)拥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及伦理;(3)强调利他主义及服务公众的精神;(4)必须通过各种激烈的测验、检核及认证(license)过程;(5)具高度的社会威望;(6)高收入;(7)职业升迁有固定的模式或阶层(occupational career pattern or ladder);(8)就业市场具独占性;(9)自主性。参见: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p. 14.

的特性。〔1〕 同样地,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也绝不完全等同于其他欧美国家的经验。着重体会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境,将是本文撰写的主要目标。

此外,大陆方面近年曾经将美国史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所写有关学科体制的单篇论文集译成书。其中沙姆韦(David R. Shumway)和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二人所撰《学科规训制度导论》和霍斯金(Keith W. Hoskin)的《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二文,对于本文在观念上的厘清甚有帮助。《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着重从字源意义上去分析“学科规训”制度所代表的知识和权力两种含义,并且追溯西方学科制度生成的历史。〔2〕 而霍斯金的论文则强调:所有新兴知识门类的出现,其实都是教育形式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换言之,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三种新的教育实践方式——考试、书写、评分,不但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执教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因为教学双方都必须同时面对经常性的监视和评断,以致逐渐衍生出一种自我规训的力量。〔3〕

相较于西方史家对学科问题关注的程度,中文著作有关这方

〔1〕 McClelland 认为:英、美两国较具自由结社的传统,因而像律师这种职业,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会特别强调律师公会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像德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力量高过一切,所以职业市场的独占性反而是造就德国法学专业化的重要特质。参见: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pp. 11-27.

〔2〕 沙姆韦(David R. Shumway)、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学科规训制度导论》,收入: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12—42。

〔3〕 霍斯金(Keith W. Hoskin),《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收入: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页43—84。

面的研究显然相当不足,〔1〕特别是以历史学为核心的探讨更是付之阙如。20年前汪荣祖在一篇名为《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的论文中,提到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乃是奠定在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三个基础之上。学院化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史学逐渐摆脱政教附庸或贵族余兴的地位,一方面则促进了专业化时代的来临,历史研究开始由专人负责,并且渐渐成为一种精细的“科学研究报告”。至此,史学才随着近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的要求,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2〕这篇文章成文的时间很早,可惜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论述,但文中所提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等三大指标,对于思考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之间的关系极具启发性。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在已知的研究撰著中并没有直接相关的论述出现,而与此一主题较为切近的研究形态,则通常以描述大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方式呈现。例如郑之书的《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育(1902—1917)》,便是以课程规划、教师来源和教本内容分析等三个方向,缕述清末民初各级学校施行历史教育的状况。〔3〕而大陆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张文建二人所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一书,立有一节专论清末《奏定学堂章程》对大中小学堂历史课程的规划,以及20世纪初因应新式教育而出现的各种

〔1〕 十几年前金耀基曾经集录一册以大学为核心的短篇论文集,勉强可以视为有关学科体制的讨论。而大陆地区,近年则有《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一书,以教育制度史的方式,介绍清末壬寅、癸卯学制以降,以至1922年所颁布的壬戌学制之间的比较与分析。见: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

〔2〕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收入: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页221—233。

〔3〕 郑之书,《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育(1902—1917)》(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91年6月)。

历史教科书。〔1〕其他如彭小甫的《析论〈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外国文史教学的方策》、〔2〕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历史教学及相关问题之讨论》〔3〕等,也都是这几年有关近代历史教育的单篇论文。然而这类以教育史为取径的研究,由于在概念上往往视历史教育与史学研究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所以尽管在研究对象上同样是以课程、教材、师资等作为观察焦点,但与本文企图从学科体制的角度出发,讨论现代中国史学如何借由制度化的形式,逐渐达成独立化、专业化的目标有很大的不同;而历史教育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诠释循环,〔4〕也每每是这类研究十分忽略的重要环节,不及此,无以知学术内在发展的理路,如何左右学术制度建立的过程,也难于厘清制度所形构的力量,对学术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另一个相近的主题,则是以个别学校或研究机构为对象的观察。如黄福庆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

〔1〕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页256—271。在此之前张文建曾单独发表过一篇《清末历史教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文章,观点与内容与前著十分接近。见:张文建,《清末历史教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页50—58。

〔2〕 彭小甫,《析论〈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外国文史教学的方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1989年,页241—302。

〔3〕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历史教学及相关问题之讨论》,《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8期,1996年,页397—409。

〔4〕 黄俊杰曾在一场教学研讨会中,批判学界流行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视为两种不同范畴的说法。他认为研究者或施教者的“现实关怀”与“价值意识”,必然会反映在他们从事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并且自然而然形成二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和“诠释循环”。见:黄俊杰,《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之关系》,收入:王寿南、张哲郎主编,《中华民国大学院校中国历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1992年),页141—173。

(1924—1937)》、〔1〕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等,〔2〕皆是典型校史形式的著作。这类作品虽然可以提供本文背景参照的作用,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一种学科形式的研究。而查时杰所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3〕苏云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4〕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5〕以及大陆学者何建明的《辅仁国学与陈垣》、〔6〕陶飞亚、吴梓明的《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等一类的论著,〔7〕则比较倾向用学术史的眼光,去观察几个不同学校历史科系或“国学”相关系所的发展。〔8〕在议题上虽然比较接近本文论述的主体,但在范围上却不足以呈显史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全貌,以及它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最后,像是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9〕或是黄进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述“新史学”的诞生及

-
- 〔1〕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 〔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8月)。
- 〔3〕 查时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页617—648。
- 〔4〕 苏云峰,《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收入: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89—337。
- 〔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
- 〔6〕 何建明,《辅仁国学与陈垣》,收入: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33—265。
- 〔7〕 陶飞亚、吴梓明,《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页59—100。
- 〔8〕 陶、吴二人与何建明论文中所涉之“国学”教育,皆是以国文系和历史系作为观察对象。
- 〔9〕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收入: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页44—105。

其所面临的困境》等专论 20 世纪新史学的论文,^[1]则与本文讨论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范围、特性,以及如何向西方转化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这类著作同样不是从学科体制的角度出发,所以对史学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及其与制度规训之间的关系,难免因侧重点的不同而有向隅之处。

对照中西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置身的环境有多么陌生。选择这个论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希望透过任何西方既成的观点来检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而只是想深入了解传统史学在整个教育体制彻底西化之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对身处其中的我们,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分别从外在形制与学术内涵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呈显学术与其所托蔽的制度之间彼此的互动与关联。

在章节安排上,全书分为五章,除绪论、结论之外,第二章“学制建立与历史教育系统化的出现”,将首先从晚清新式学堂采行分科教育的内容及清朝政府历次颁布的学堂章程中,观察近代学科体制最初建立的过程,并且分析当时左右学堂发展至巨的“中体西用”思想,究竟如何影响学堂设科分类的概念。而向来扮演为经学举证事例角色的传统史学,此时又是以何种姿态开启与西方史学的对话之门?本章将以学堂设科的具体例证和《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中西史学课程的细部规划,分析学科体制对传统知识结构的冲击,以及清末学人对此问题的看法。最后,将讨论清末盛极一时的重编国史运动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朝野双方各自不同的解喻下,对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章“新史学与学院化史学之建置”,将首先以民国初年唯一设立的北京大学史学系作为观察焦点,探讨现代中国史学如何

[1]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年,页263—285。